

25

茅盾與外國文學

黎舟、闕國虬◎著

茅盾研究
八十年書系

錢振綱·鍾桂松◎主編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茅盾研究
八十年書系



錢振綱·鍾桂松◎主編

黎舟、闕國虬◎著

25

茅盾與外國文學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常州大學圖書館
藏書章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茅盾與外國文學／黎舟、闕國虬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4〔民 103〕

目 2+166 面；19×26 公分

（茅盾研究八十年書系；第 25 冊）

ISBN：978-986-322-715-1（精裝）

1. 沈德鴻 2. 西洋文學 3. 文學評論

820.908

103010310

中國茅盾研究會《茅盾研究八十年書系》編委會

主 編：錢振綱 鍾桂松

副主編：許建輝 王中忱 李 玲

特邀顧問：

邵伯周 孫中田 莊鍾慶 丁爾綱 萬樹玉 李 岫

王嘉良 李廣德 翟德耀 李庶長 高利克 唐金海

ISBN-978-986-322-715-1



茅盾研究八十年書系

第二五冊

ISBN：978-986-322-715-1

茅盾與外國文學

本書據廈門大學出版社 1991 年 8 月版重印

作 者 黎舟、闕國虬

主 編 錢振綱 鍾桂松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 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4 年 7 月

定 價 60 冊（精裝）新台幣 12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茅盾與外國文學

黎舟、闕國虬 著

作者簡介

黎舟（1925～2004），原名呂榮春，江蘇吳江人。1949年畢業於廈門大學外文系，1954年後一直在福建師範大學中文系執教，歷任中文系副主任、教授，致力於中國現代文學與外國文學關係的比較研究，專著有《新文學大師的選擇》、《魯迅與中外文學遺產論稿》（合著）、《茅盾與外國文學》（合著）等，曾以筆名方晨出版過詩集《出發》。

闕國虬，1946年出生於福建福州，1982年畢業於福建師範大學中文系中國現代文學專業，獲文學碩士學位。歷任福建師範大學中文系副教授、福建教育出版社社長、總編輯、編審，曾獲全國百佳出版工作者榮譽，著有《茅盾與外國文學》（合著）、《怎樣寫報告文學》等。

提 要

本書以世界文學和比較文學的宏闊視野，綜合考察茅盾與外國文學的關係。在比較研究中注重史料發掘和實證分析，辯證把握借鑒與獨創的複雜關係，深入系統地探討茅盾的文藝思想、小說創作和翻譯研究與外國文藝思潮流派的有機聯繫，著重揭示和總結茅盾對待現實主義、自然主義、現代主義思潮及其代表作家所採取的取精用宏、博採眾長而自鑄偉辭、獨創一格的大家氣度和成功經驗，並在小說藝術的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上頗有精到的見識和縝密的論析。論題集中，思路開闊，辨析入微，論證周密，堪稱茅盾與外國文學關係研究的專精力作。



目

次

引 言	對外國文學的自覺接受和揚棄	1
第一章	「窮本溯源」與「取精用宏」——譯介外國文學的進程和歷史特色	5
第一節	譯介外國文學的理論	5
	傳播「世界的現代思想」與尋求藝術上的借鑒	6
	選材原則：「切要」、「系統」、「合乎我們社會與否」	9
	譯介外國文學的步驟與必備的修養	11
	翻譯外國文學作品的標準和方法	13
第二節	譯介外國文學的進程	15
	從文學「為人生」出發譯介外國文學	15
	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品的介紹	19
	翻譯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的文學作品	20
	建國後在介紹外國文學上的新貢獻	21
第三節	譯介外國文學的歷史經驗	22
	研究和譯介外國文學的密切結合	22
	既重視社會功利目的，又不忽略藝術技巧的學習	25
	廣泛介紹和重點借鑒	27
	在取精用宏中革新創造	28
第二章	「現實主義屹然為主潮」——現實主義文藝觀與外國文藝思潮流派的關係	31
第一節	早期文藝思想與歐洲近代文藝思潮	32
	為人生：一個不僅僅屬於文學的起點	32
	俄國文學：新世紀的「激動和影響」	35
	現實主義：一個歷史的選擇	40
	時代的特色	52
第二節	革命現實主義文學觀與蘇聯文學的影響	55
	無產階級文學觀的最初形成	55
	從「新寫實主義」到「社會主義現實主義」	58
	「鍛煉出一雙正確而健全的普羅列塔利亞意識的眼睛」	60
	「最最主要的還是充實的生活」	62
	方法和技巧	64

第三節	與新浪漫主義的關係	66
	「提倡」新浪漫主義的出發點	66
	「主義的寫實主義」與「新理想主義」	69
	「新」派文藝譯介中的「拿來主義」	72
	對「現代派」的再評價	76
第三章	中國現代歷史的恢宏畫卷——小說創作	
	外來影響之一	79
第一節	「真實」的品格	80
	對生活真實的尋求	80
	客觀描寫	83
	社會分析的理性框架	85
	細節描寫的真實與其象徵寓意性的統一	88
第二節	縱向考察：編年史的方式	90
	歷史的興趣	90
	三十年壯劇的一道「印痕」	93
第三節	橫向考察：從都市照見全社會	97
	社會性：一種對文學的自覺	97
	都市的發現	98
	理論的探尋	99
	複雜而多彩的都市人生	104
	都市陰影下的農村	109
第四章	藝術地掌握世界的多樣性——小說創作	
	外來影響之二	113
第一節	小說創作與現代主義	113
	對象徵主義的借鑒	113
	幻象、幻覺描寫	120
	自由聯想、內心獨白與意識流	124
第二節	小說創作的藝術手法與外國文學的關係	126
	小說觀念上的變化	127
	「心靈的辯證法」	128
	寫景與抒情的結合	134
	開放性的網狀結構	137
結束語	對世界文學的貢獻	141
附錄一	茅盾與外國文學關係研究述評	151
附錄二	茅盾與外國文學關係研究資料索引	161
後記		165

引言：對外國文學的自覺接受和揚棄

歷史的經驗表明，世界文化交流有力地推動了人類社會的進步和促進了人類文化的發展。事實上，任何一個國家的文學都不能脫離歷史和世界的聯繫而被孤立地創造出來。它既是處在與本國文學傳統的前後聯繫之中，又是處在與其他國家文學的橫向交流之中。在批判地繼承本民族文學傳統的同時，積極而又有選擇地吸收和借鑒外國文學，正是促進一個民族的文學發展和繁榮的重要條件。馬克思、恩格斯在 19 世紀 40 年代，曾以近代人類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的世界性為前提，明確地提出了具有特定內涵的「世界文學」的概念。他們認為，由於世界市場的形成和開拓，在各民族之間交往日益頻繁的情況下，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各民族的精神產品必將成為全世界人民的公共財產，並由此而展望了未來世界文學發展的光輝前景。

具有悠久歷史和光輝傳統的中國文學在它的成長和發展的過程中，一方面在幾個重要的歷史時期曾程度不同地吸收了外來文化的養料，另一方面又被陸續介紹到世界上一些地區和國家，並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尤其是到了近現代，由於社會改革和文化發展需要所促成的「西學東漸」，中國文學與世界其他國家文學之間的關係，也就顯得更加密切。魯迅曾經說過，「沒有拿來的，文藝不能自成爲新文藝」（註 1）。捷克漢學家馬立安·嘎立克也認為，中國現代文學「既是本國傳統與努力的產物」，「也是對外國文學影響的複雜的接受——創造過程的產物」（註 2）。從「五四」文學革命開始，在文學觀念和創作

〔註 1〕 《且介亭雜文·拿來主義》。

〔註 2〕 《中西文學關係的里程碑》，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0 年 8 月出版。

上所發生的重大變革，外來文化、文藝思潮的影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一部中國現代文學史，實際上是一部在繼承本民族優秀文學傳統的基礎上，不斷地加強與世界各國文學之間的聯繫，對之進行自覺的選擇、吸收、揚棄，從而不斷豐富和發展自己的歷史，也是一部在吸收外來文化滋養之後，在開拓和創新中，又轉而向全世界提供自己的藝術珍品，進一步充實世界文學寶庫的歷史。在這一中外文化、文學交流過程中，我國現代進步文化的先驅者們作出了開創性貢獻，而茅盾就是其中建立了光輝業績的一位。

對一位作家來說，他的民族文化修養是接受外來影響重要基礎和前提。如果缺少這種修養，也就無法對中外文化進行辨異和認同，更不可能有效地吸收外來文化的精華。茅盾與魯迅、郭沫若等新文化巨人一樣，從小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薰陶，具有深厚、堅實的舊學基礎。「五四」運動爆發後，他為外來進步文化思潮所驚醒，「從魏晉小品，齊梁詞賦的夢遊世界伸出頭來」〔註3〕，發現了另一個廣闊的精神天地和參照系。從此，他以恢宏的氣度，寬廣的視野，自覺地進行對外國文學的研究和譯介工作，並將它看成是「取精用宏，吸取他人的精萃化為自己的血肉」，從而達到「創造劃時代的新文學」〔註4〕這一崇高目的所不可缺少的步驟和方法。60多年來他對譯介外國文學的積極倡導及其具體實踐，既溝通了中國文學與歐美文學以及世界被壓迫的弱小民族文學之間的聯繫，傳播了先進的文藝思潮和新鮮的藝術經驗，推動了我國新文學的發展，又有效地提高了自身的文學素養，使他的植根於中國社會生活土壤的現實主義文學觀和創作逐漸趨於成熟。

對「五四」以來中外文學的撞擊、交流現象，固然需要在世界文學的整體框架之內，從宏觀上探討、總結它演變、發展的客觀規律，但與此同時，又必須重視有較大影響的著名外國作家與中國新文學的關係，著名現代中國作家與外國文學關係的比較研究，並將它視為構築20世紀中外文學關係研究大廈的基石。也只有將這密切相關的兩個方面的工作做好了，整體的宏觀研究才有牢固的堅實的基礎。就茅盾與外國文學的關係而言，無論是他的譯介外國文學進程及其歷史特色，還是他在文學評論與創作活動中對外國文學的借鑒和揚棄，其內容都是極為豐富的，深刻、系統地進行這一方面的研究，

〔註3〕 《契訶夫的時代意義》，《世界文學》1960年1月號。

〔註4〕 《我走過的道路》（上），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10月出版。

既有助於更準確地認識茅盾本人及其光輝的文學業績，而且通過這一特定側面，也能更具體、深入地了解適應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要求，幾經外來文藝思潮的激蕩，終於脫離舊套，自創具有鮮明、獨特的時代和民族風格的新文學的偉大進程。而且，它所體現的歷史經驗，對於我們今天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如何正確對待外來文藝思潮流派，如何辯證地處理借鑒與繼承，借鑒與革新、創造之間的關係，也能提供有益的啟示。

對茅盾與外國文學關係的研究，可以是局部的，也可以是整體的。分別就他與某一國別文學，與某一外國作家的關係進行深入的研究，當然是十分必要的。在這一方面，自新時期以來已有不少研究者付出了辛勤的勞動，並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是，我們又必須看到，茅盾對外國文學的借鑒是多方面，綜合性的，並不僅限於某一國別文學，某一外國作家，這是他自己曾多次予以說明的。正是考慮到這一情況，本書擬超越局部的影響比較，從總體上闡明茅盾譯介外國文學的歷史經驗，探討茅盾的文學思想和創作與外國文學之間的內在聯繫及其對後者的揚棄，並進而就其文學史意義和美學意義作出闡釋。

歌德曾經說過，「最能接受影響的人，也是最有個性的人」。^{〔註5〕}茅盾對外國文學的借鑒顯然並不是單純的被動的接受，而是一種體現主體的審美理想的「取精用宏」，富於革新精神的創造性活動。將它理解為直線的決定與被決定的因果關係是並不符合客觀實際情況的。正如蘇聯比較文學家A·S·布什明在談到兩國或兩國以上的文學遭遇現象中「文學連續性」時所說的，「最高的接觸——拿來現象應該是無跡可求的，用哲學的話來說，這種拿來應該是一筆勾銷」^{〔註6〕}。捷克漢學家馬立安·嘎立克也明確指出，「所謂 Snyatie (Aufheben，揚棄) 一詞用於黑格爾哲學之中，意思為某種東西的消滅，克服，同時也是這種東西的保存和提升到一個更高的發展階段。按照這樣的解釋，『影響』就好像是來自作為發送者一方的文學的一個刺激，這一刺激在作為接受者的文學中被『勾銷』和『克服』，以便它能夠在這一文學中被創造性地保存下來，當然，是以另一種形式保存下來」^{〔註7〕}。我們

〔註5〕 轉引自《比較文學研究譯文集》，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7月出版。

〔註6〕 《文學發展的連續性》，轉引自《中西文學關係的里程碑》，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8月出版。

〔註7〕 《中西文學關係的里程碑》。

正試圖在「五四」以來廣闊的時代背景和文化背景上，密切聯繫茅盾的文化心理結構和審美理想，在動態中較為深入地研究他對外國文學的擇取和揚棄過程，也即他在自覺主動的選擇的同時，所作出的自創具有時代、民族特色的個人風格的新文學的過程。當然，這或許只體現了我們的真誠願望和努力方向，在實踐中未必能圓滿地體現上述目標。我們誠摯地期待著專家和讀者們的批評，指正！

第一章 「窮本溯源」與「取精用宏」 ——譯介外國文學的進程和 歷史特色

第一節 譯介外國文學的理論

茅盾是中國新文學運動創始人之一。他不僅是偉大的革命文學家，而且也是卓越的外國文學研究家、翻譯家。在他長達六十餘年文學生涯中，對外國文學的翻譯、介紹，占有重要地位。他同魯迅一樣，從譯介外國文學開始他的文學活動，並貫穿於始終。

我國譯介近代西洋文學開始於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文學改良運動，「五四」文學革命則在更大規模上掀起一個譯介外國文學的高潮，而且在內容和方法上都起了深刻的變化。「翻譯文藝，和本國文藝思潮的發展，關係最大」。^{〔註1〕}魯迅曾經指出，「新文學是在外國文學潮流的推動下發生的」，^{〔註2〕}茅盾也曾說過，「翻譯文學曾為中國的現實主義文學的來臨，作了開路先鋒」，^{〔註3〕}這就清楚地說明譯介外國文學在促進新文學運動的發生與發展上所起的重大作用。茅盾作為新文學運動先驅者之一，數十年來不僅辛勤地從事譯介外國文學的具體實踐，而且更從世界文化交流與革新中國文學的高度，就譯介

〔註1〕 胡愈之：《寫實主義與浪漫主義》，《東方文庫》第61種。

〔註2〕 《集外集拾遺補編·〈中國傑作小說〉小引》。

〔註3〕 《現實主義的道路》，重慶《新蜀報》副刊《蜀道》，1941年2月1日。

外國文學的目的、原則與方法等問題，在理論上作過許多深刻的闡述，產生了深遠影響。直到晚年，他還通過對歷史經驗的回顧與總結，就研究和介紹外國文學的一些重大問題，發表了不少精闢的意見。

傳播「世界的現代思想」與尋求藝術上的借鑒

「從歷史上看，一種新的文藝運動必然根源於新的思想運動，而同時又為其先驅。中國的新文藝運動也不是例外」。^{〔註4〕}「五四」時期，新文學界十分強調時代所賦予的思想啓蒙任務。因此，當時對外國文學的譯介，首先也是從思想教育這一社會功利目的出發的。那就是通過譯介外國文學來傳播先進思想，改變人們的精神，從而進一步促進社會的改造。早在1905年，魯迅在《〈域外小說集〉序》中就曾經說過，「我們在日本留學的時候，有一種茫漠的希望：以為文藝是可以轉移性情，改造社會的。因為這意見，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紹外國新文學這一件事」。「五四」文學革命發生後，魯迅譯介外國文學，更具有「高度的革命責任感與明確的政治目的性」。^{〔註5〕}從他所譯介的被壓迫弱小民族文學與近代俄國、日本文學，可以看出，他首先是從醫治中國舊思想的「痼疾」，啓發人民的覺悟這一高度來確定翻譯選題的。郭沫若在關於譯介外國文學的社會目的性上，也有與魯迅相類似的看法。他之所以在五四運動高潮中著手翻譯歌德的名著《浮士德》，主要因為「作品的內容很像我國的『五四』時代，摧毀舊的，建立新的」，^{〔註6〕}可以激起當時中國青年讀者思想感情上的共鳴。茅盾早期對譯介外國文學的社會意義所持的見解，與魯迅、郭沫若大體上相一致。由於當時他處在一個有全國影響的新文學重要刊物《小說月報》主編的地位，籌劃對外國文學的譯介工作，因而他在這一方面作了更為充分的論述。

茅盾早年強調譯介外國文學的社會功利目的，與他「為人生」的現實主義文學主張有著緊密的聯繫。他曾明確指出，「我們為人生的藝術而介紹西洋小說」，^{〔註7〕}十分重視文學作品的思想傾向性及其所產生的社會效果。

〔註4〕 茅盾：《五十年代是「人民的世紀」》，《抗戰文藝·文協成立七周年特刊》，1945年5月。

〔註5〕 茅盾：《學習魯迅翻譯介紹外國文學的精神》，《世界文學》1977年第1期。

〔註6〕 《談文學翻譯工作》，《郭沫若論創作》，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年6月出版。

〔註7〕 《西班牙寫實文學的代表者伊本納茲》，《小說月報》第12卷第3號，1921年3月。

從對歐洲文學史的系統考察與深入研究中，他認識到一時代的文學與該時代的哲學、社會思潮之間的內在聯繫。他認為，一個時代的新文學與新思潮之間是互相依賴的，即「新文學要拿新思潮做泉源，新思潮要借新文學做宣傳」。^{〔註8〕}他曾以外國著名作家的作品為例說明，「沒有一種立得住，傳得下的文學，不靠思想做骨子」，「反過來講，也可以說凡是一種新思想，都要靠文學的力量去宣傳」，^{〔註9〕}「借文學的描寫手段和批評手段去『發聾振聵』」^{〔註10〕}。18世紀個人主義的新思潮，發源於盧梭的小說；19世紀家庭個性主義的新思潮，起於易卜生的劇本；尼采的超人哲學，也結晶在小說裡；赫爾岑是俄國少年黨的中堅，他的《誰之罪》便是部小說；托爾斯泰主張人道主義、勞動主義，羅曼·羅蘭宣揚大勇主義，如此等等，「自來新思潮的宣傳，沒有不靠文學家做先鋒呀！」^{〔註11〕}茅盾極其坦率地承認，自己也是「主張用文藝來鼓吹新思想的」^{〔註12〕}。並明確指出，「中國現在正是新思潮勃發的時候，中國文學家應當有傳播新思潮的志願，有表現正確的人生觀在著作中的手段」^{〔註13〕}。由此出發，他強調「介紹西洋文學的目的，一半果欲是介紹他們的文學藝術來，一半也為的是欲介紹世界的現代思想——而且這應是更注意些的目的」^{〔註14〕}。茅盾在這裡所說的「世界的現代思想」，主要指「民主與科學」的思想，它是「新文藝精神之所在」^{〔註15〕}，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被用來作為反對封建傳統思想與愚昧、落後觀念的精神武器。「民主與科學」體現在文學思潮上，則是「為人生」的現實主義文學觀點。茅盾還針對在過去漫長的封建社會裡，中國「尚未有成熟的『人的文學』」這一情況指出，通過外國文學的翻譯，也可以達到「療救靈魂的貧乏，修補人生的缺陷」這一社會目的^{〔註16〕}。由此可見，茅盾早期譯介外國文學的觀點與他的「為人生」文學觀之間的有機聯繫。當時，茅盾不僅認為新文

〔註8〕 《為新文學研究者進一解》，《改造》第3卷第1號，1920年9月。

〔註9〕 《近代文學體系的研究》，上海新文化書社1921年12月出版。

〔註10〕 《現在文學家的責任是什麼？》，《東方雜誌》第17卷第1期，1920年1月。

〔註11〕 《現在文學家的責任是什麼？》，《東方雜誌》第17卷第1期，1920年1月。

〔註12〕 《對於系統的經濟的介紹西洋文學底意見》，《時事新報》副刊《學燈》，1920年2月4日。

〔註13〕 《現在文學家的責任是什麼？》

〔註14〕 《新文學研究者的責任與努力》，《小說月報》第12卷第2號，1921年2月。

〔註15〕 《五十年代是「人民的世紀」》。

〔註16〕 《一年來的感想與明年的計劃》，《小說月報》第12卷第12號，1921年12月。

學創作應該是「爲人生」的，而且也將譯介外國文學看作能爲「改良人生」，「指導人生」這一社會目的服務的一種手段。1925 年以後，茅盾所介紹的「世界的現代思想」又增加了新的內涵，即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與文藝觀。

新文學運動初期，在譯介外國文學上首先重視政治思想標準的做法，儘管在另一方面也曾產生「急於事功，竟沒有翻出有價值的作品來」〔註 17〕的缺陷。茅盾後來也曾指出，「西洋文學名著被翻譯介紹過來的，少到幾乎等於零，因而所謂『學習技巧』云者，除了能讀原文，就簡直談不到」〔註 18〕。但是，當時茅盾並未因「注重思想」而忽視外國文學作品的藝術性。他將譯介外國文學的社會功利目的置於重要地位的同時，也充分認識這一工作對於新文學創作藝術上的借鑒作用。他曾辯證地指出，「文學作品雖然不同純藝術品，然而藝術的要素一定是很具備的。介紹時一定不能只顧著這作品內含的思想而把藝術的要素不顧」。〔註 19〕他說，「多譯研究問題的文學果然是現社會的對症藥，新思想宣傳的急先鋒，卻未免單面；只揀新的譯，卻未免忽略了文學進化的痕跡」，〔註 20〕還要注意翻譯一些藝術手段高明的文學，因為「總得先有了客觀的藝術手段，然後做問題文學做得好，能動人」，「然後我們創造自己的新文藝有了基礎」。〔註 21〕他在主持《小說月報》的「小說新潮欄」伊始，就草擬了一個翻譯外國文學作品的計劃，第一步先譯藝術性較高的，第二步才譯問題劇，問題小說。這樣也就防止了只重思想內容而不重藝術形式的另一種傾向的產生。他認爲，當今之時，「就文學技術的主點而言」，「翻譯的重要實不亞於創作」，主張「一定要採用」「西洋人研究文學技術所得的成績」；強調「用了別人的方法（引者按：指技巧），加上自己的想像情緒，……結果可得自己的好的創作」。〔註 22〕他在《法國文學對歐洲文學的影響》一文中，曾以 18 世紀後半西班牙一些作家因單純模仿法國文學而未能在文學創作上取得重大成就爲例說明，「僅僅模仿別國是不行的，而吸取別國文學的精神以滋溉自己，卻是可行的；而且由此而成的創作也可以成爲傑作」。爲此，他讚揚西班牙寫實主義作家伊本納茲「採莫泊桑描寫的技術，取自己鄉土的材

〔註 17〕 魯迅：《準風月談·由聾而啞》。

〔註 18〕 《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導言》，1935 年 3 月。

〔註 19〕 《新文學研究者的責任與努力》，《小說月報》第 12 卷第 12 號，1921 年 2 月。

〔註 20〕 《小說新潮欄宣言》，《小說月報》第 11 卷第 1 號，1920 年 1 月。

〔註 21〕 《小說新潮欄宣言》，《小說月報》第 11 卷第 1 號，1920 年 1 月。

〔註 22〕 《一年來的感想與明年的計劃》。

料，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眼光，去研究觀察」，然後寫出「有獨立的生命」的小說。〔註 23〕從這可以看出，茅盾所主張的對外國文學藝術上的借鑒，最終是以革新、創造為依歸的。

選材原則：「切要」、「系統」、「合乎我們社會與否」

茅盾早期根據他對譯介外國文學目的意義的認識，在翻譯的選材問題上，提出了應注意「切要」、「系統」、「合乎我們社會與否」這三個重要原則。按照茅盾的解釋，所謂「切要」，就是要考慮「時間人力上的經濟」，「選最要緊最切用的先譯」。〔註 24〕他還說，「又因為中國尚沒有華文的詳明的西洋文學思潮史，所以在切要二字以外，更要注意一個系統字」〔註 25〕所謂「系統」，指不能隨便地「只顧拉出幾本名家著作譯譯」，而是要根據西洋文學發展史，考慮作品發表的時間程序，「比如譯表象主義劇本，自然總得先譯易卜生的 *Msstor Builder* 等等，然後可譯《群盲》和《青鳥》」；如果「《群鬼》之後接上一篇《華倫夫人之職業》」，「在藝術眼光看去，未免缺了系統的精神了」。〔註 26〕所謂「合乎我們社會與否」，即要結合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選擇最需要最合適的來翻譯，如譯英國作家蕭伯納的劇本，與其譯《華倫夫人之職業》，不如譯《陋巷》，「因為中國母親開妓院，女兒進大學的事尚少，竟可說沒有。而蓋造低賤市房以剝削窮人的實在很多」。〔註 27〕又如易卜生的《群鬼》一篇，便可改譯《少年團》，「因為中國現在正是老年思想與青年思想衝突的時代，young generation 和 old generation 爭戰的決勝的時代」〔註 28〕。茅盾所提出的三個選材原則，是以中國社會現實的需要與讀者易於接受為核心的。由此，他在主編《小說月報》時，「著重介紹 19 世紀的俄國文學，被壓迫民族的文學，以及 19 世紀各國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的作品。而對於其他外國的古典名著只作一般的介紹。」〔註 29〕

茅盾還認為，對外國文學的研究與介紹，應根據實際情況，分別提出不同的具體要求。前者是一種專門性工作，而後者則涉及社會上廣大讀者，因

〔註 23〕《西班牙寫實文學的代表者伊本納茲》。

〔註 24〕《對於系統的經濟的介紹西洋文學底意見》。

〔註 25〕《對於系統的經濟的介紹西洋文學底意見》。

〔註 26〕《對於系統的經濟的介紹西洋文學底意見》。

〔註 27〕《對於系統的經濟的介紹西洋文學底意見》。

〔註 28〕《對於系統的經濟的介紹西洋文學底意見》。

〔註 29〕《我走過的道路》（上）。

而他明確提出，「研究是非從系統不可」，〔註 30〕而且「愈久愈博愈廣，結果愈佳，即不論如何相反之主義咸有研究之必要」，〔註 31〕而「介紹卻不必定從系統（單就文學講），若是照系統介紹的辦法辦去，則古典的著作又如許其浩瀚，我們不知到什麼時候才能趕上世界文學的步伐，不做個落伍者！」〔註 32〕這也就是說，在介紹時還要以社會需要放在首位，不能強調以系統性為主。這與前面所說的系統，即翻譯一個文學流派的作品要注意寫作時間的先後，便於使人了解，是從兩個不同側面來提出問題的，實際上並無矛盾。他在答覆《小說月報》讀者來信時就曾經說過，「個人研究與介紹給群眾是完全不同的兩件」，「個人研究固能惟真理是求，而介紹給群眾，則應審度事勢，分個緩急」。〔註 33〕他強調「介紹時的選擇是第一應得注意的」，〔註 34〕並提到要注意「分別那些是不可不讀的及供研究的兩項」，「不可不讀的，大抵以近代為主」，而且要「少取諷刺體的及主觀濃的作品，多取全面表現的，普通呼籲的作品」〔註 35〕。這與《文學研究會叢書緣起》中所明確指出的，「我們在這個叢書中，所介紹的世界文學作品，只限於近代的」精神完全相一致。茅盾根據這一原則，認為俄國作家安得列夫、阿爾志跋綏夫的具有虛無主義、唯我主義傾向的《黑假面人》，《沙寧》等作品，要考慮它們對中國青年讀者思想上可能產生的不良影響，不宜加以介紹。其他如英國唯美主義作家王爾德的「藝術是最高的實體，人生不過是裝飾」的思想，正好與「現代精神相反」，因而「他的『人生裝飾觀』的著作，也不是篇篇可以介紹的。」

新文學運動初期，在有關外國文學的譯介與研究的關係以及由此而涉及的翻譯《浮士德》等作品是否切要等問題上，茅盾與郭沫若之間看法不盡相同，曾經有過論爭。郭沫若從應更多尊重個人的自由意志出發，比較強調翻譯家的主觀動機與能動作用，認為「人盡可隨一己的自由意志，去研究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學作品」，而「翻譯之於研究」，則是「一條線的延長」，〔註 36〕兩者不能截然分開。他說，「翻譯家在他的譯品裡面，如果寄寓有創作精神；

〔註 30〕《通信》，《小說月報》第 12 卷第 2 號，1921 年 2 月。

〔註 31〕《〈小說月報〉改革宣言》，《小說月報》第 12 卷第 1 號，1921 年 1 月。

〔註 32〕《通信》，《小說月報》第 12 卷第 2 號。

〔註 33〕《通信》，《小說月報》第 13 卷第 7 號，1922 年 7 月。

〔註 34〕《新文學研究者的責任與努力》，《小說月報》第 12 卷第 2 號，1921 年 2 月。

〔註 35〕《新文學研究者的責任與努力》，《小說月報》第 12 卷第 2 號，1921 年 2 月。

〔註 36〕《論文學研究與介紹》，《郭沫若論創作》，上海文藝出版社 1983 年 6 月出版。